

市委原书记被“政治骗子”骗500万元背后

韩城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褚锦锋曾主政此地，担任三年多市委书记。褚锦锋曾在多个场合谈到了司马迁，认为《史记》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评判是非的参照标准。

然而《史记》记载的诸多历史教训并未令其警醒，去年3月中旬，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陕西省果业中心党委书记、韩城市委原书记褚锦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今年4月，官方披露有关褚锦锋的更多贪腐细节。陕西省纪委监委指出，褚锦锋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于一身的腐败典型，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被“政治骗子”骗走500万元。

褚锦锋生于1966年3月，18岁考入渭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渭南市财政局工

作多年，曾任渭南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2002年12月，褚锦锋到韩城市（省辖县级市，渭南市代管）工作，36岁任市政府副市长，之后历任渭南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县），渭南市发改委主任等职。

2016年1月，褚锦锋再到韩城市工作，任韩城市市长（副厅长级），2018年4月任韩城市委书记，2021年8月任陕西省果业中心党委书记，直至去年3月被查。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果业中心是陕西省农业厅直属单位，副厅长级干部褚锦锋在此工作一年半后被查。

韩城市是褚锦锋仕途的重要一站。包括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在此工作时间超过8年，其中任市委书记三年多。



新华社 供图

接“天线”被骗走500万元

褚锦锋是如何被骗走500万元的？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这与一位谎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李军（化名）有关。2018年7月，担任韩城市委书记仅三个月的褚锦锋在北京结识了李军。

陕西省纪委监委披露的信息显示，彼时的褚锦锋从市长跃升市委书记，特别是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和身份的变化激发了他的野心。褚锦锋萌生了要干大事、居高位的想法，“错误地认为不仅要能干事，关键还要让领导知道自己会干事”。

上文提到的李军是韩城当地企业老板王某引荐给褚锦锋的，李军告诉褚锦锋，自己认识“大领导”，可以为其在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两人一时竟以兄弟相称。

同年8月，李军提出需要500万元“活动费”，褚锦锋遂安排韩城市一家市属国有企业董事长王某，挪用公款450万元转给李军。

一个多月后，李军再次提出需要100万元。这次，褚锦锋向一名曾在韩城市承揽过绿化工程的私人老板索要100万元转给李军。

此外，为了表达诚意，褚锦锋不仅为李军的女儿在韩城市安排了工作，而且授意组织部门违规将王某、李某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两人的入党申请书日期、职务等都是伪造的。

李军并没帮褚锦锋搭上“天线”，相反，褚锦锋还为此失了“底线”。2020年8月，李军被北京警方抓获。一年后，李军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担心结交“政治骗子”跑官买官一事败露，褚锦锋于2021年先后两次到陕西省纪委监委说明情况，谎称自己与李军交往，是为韩城光电

产业争取资金，两人并无经济往来。

之后，褚锦锋向西安某商业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索要430万元，并将自己收受他人的300万元交给王某，用于弥补挪用公款的窟窿和上述国有企业的损失。

被查后，褚锦锋说，跑官被骗败露后，整日惶惶不安，“时常在梦中惊醒，在黑暗中哭泣，血压飙升，整个人失了形，就像掉入了井中的困兽无力挣扎”。

他在忏悔书中用“痴狂”二字形容其当时的状态：“只想着大干快上出政绩，一门心思往上爬，错误地认为自己靠山不高，圈子不大，便在拉关系、找‘贵人’、搞攀附上动心思”。

另外，官方披露信息还显示，担任韩城市市长伊始，褚锦锋就向外界释放出“大搞政绩”的鲜明信号。在履新韩城市市长后所作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明确提出“打造千亿精细化工园区”“推进24个景区重点项目建设”“重点实施140个城镇建设项目”。

官方资料显示，从2015年12月到2021年8月，韩城市有545个项目存在无立项审批手续、未办施工许可证、无土地手续等违规问题，其中67个项目由褚锦锋负责决策和实施。

上马大量项目要耗费巨额资金，褚锦锋的思路是“打擦边球、闯红灯”。他把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抛之脑后，既不严控新增政府债务，也不严控隐性债务风险，甚至不惜违纪违法。

他在忏悔书中提到，项目建设基本上都是“先上车，后补票”，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类项目，大多靠政府举债、借钱融资，“因为盲目追求政绩，我没有明确制止这些问题”。

铲除滋生土壤 压缩行骗空间

“褚锦锋的案例比较典型，他急功近利，大搞所谓政绩，‘接天线’的目的就是快速获得晋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示。

对于如何防止“政治骗子”行骗，竹立家说，从源头看，最根本的是压缩“政治骗子”行骗的空间，要对岗位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公开、透明、公正、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和行使过程。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彭新林认为，“政治骗子”问题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这从侧面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管理和选拔工作存在漏洞，以及风气不正的问题。

彭新林认为，防止“政治骗子”行骗，根本的办法是要铲除“政治骗子”的滋生土壤，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体而言，即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落实好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决防止一些干部“接天线”“抱大腿”“吃快餐”“走捷径”。

此外，彭新林提到，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织牢织密监督网络，用明规则取代潜规则，坚决惩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非组织行为，真正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认为，“政治骗子”借助虚构的事实行骗，是一种客观社会现

实，治理此问题的关键，是深入探究“政治骗子”生存土壤与环境，进而探究其作用的机理，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与方案。

魏昌东认为，“政治骗子”的生存空间，既包括他们本身存在的政治环境，还包括“政治骗子”所鼓吹、营造的那一系列的职位晋升通道。“政治骗子”得逞往往是利用官员谋求以不正常路径“超常发展”，获得晋升的心理。

在魏昌东看来，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严格选人、用人制度，规范化、制度化选拔过程，堵塞非正常的晋升通道，“政治骗子”的谎言将会不攻自破，他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存在的土壤。

“政治骗子”现象，自古有之，古今中外都存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测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白智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白智立认为，防止“政治骗子”行骗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加强干部人事管理，让下级不用揣摩上级领导意图和忙于结交领导关系圈，从而使“政治骗子”失去行骗的机会。从褚锦锋的案例看，“政治骗子”行骗背后有巨大的利益交换和利益链，跑官买官成为赤裸裸的投资与回报关系。白智立说，第二条途径是斩断官员投资“政治骗子”的资金来源。

时事·社会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肖星平

数字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如何突围？

数字化时代，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变、网络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的双重背景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

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关闭与重张之间、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的独立价值也被重新审视。

面临多重困境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现，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手机阅读成为主要形式。“数读”比“纸读”更受青睐的背景下，选择“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的成年国民不足半数。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下，有网友回复：“坐地铁、挤公交，电子书可以随时读”，也有网友坦言：“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根本不想拿起本书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店的市场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冲击。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至11.93%，仅占1成多。资深业内人士三石认为，低价直播模式对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有业内人士表示，线上图书价格比线下平均低20%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从书籍种类、服务质量到环境，都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

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实体书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往往靠“图书+X”的运营模式，引入咖啡、文创、轻餐饮等才能勉强收支平衡，“多元经营下，一些书店不重视图书质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有读者告诉记者，带着孩子去书店选书，发现书品“参差不齐”，甚至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图书摆放在少儿图书区。

转型之路怎样走？

近年来，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有的转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告诉记者，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四大转变”——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变，从卖场到阅读空间的转变，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变，从单一经营到多



4月22日，在江苏省兴化市昭阳街道的一家新华书店内，阅读推广人跟孩子们分享故事。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元化经营的转变。

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发起人孙谦说，实体书店可以帮读者更方便地找到心仪的书，也能成为交友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具备打造线下优质社交的优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含章说，现在不少书店空间美、有个性，活动丰富、体验超值。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店。“线下场景中，产品、服务与消费者的接触是直接的。”三石说，实体书店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书、人与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这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今年1月举办的2024中国书店大会以“创新，重塑书店价值”为主题，鼓励书店创新管理、创新服务、转变思路。孙谦说，书店经营形态正在从“以货为本”向“以场为本”进而向“以人为本”转变。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朵云书院·戏剧店成为戏剧迷们的“天堂俱乐部”。他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

书单，还能参加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剧场”参加演出。戏剧店提出“创意共生”口号，孵化原创戏剧，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变身“产学研”基地，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由。”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说，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直在努力创新。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会场、文苑、客厅……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位一体”。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读书的时间、空间也不断压缩。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店？实体书店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思考：书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刚刚过去的3月，北京海淀，被誉为“百万学子大书房”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新开业。相隔不远，北大老牌书店“风入松”归来。被称为“爱书人的港湾”的万圣书店，也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持续吸引大批读者。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是书店的灵魂。实体书店可以靠“颜值”吸引读者，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是“内涵”。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瑞琳表示，图书选品要经过调查、筛选等，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独有的“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提出，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引导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好活下去，还需更多打造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下沉浸阅读体验，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认为，“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所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依然需要与‘附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可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在场’体验。”

在三石看来，当下大部分实体书店零售模式仍是传统的先开店、后进货、再卖货的模式，即场、货、人模式，而新的商业模式是先精准获客、其次留存、然后转化，即人、货、场模式。同时，实体书店零售和销售方式要从“物以类聚”向“人以群分”转化。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书店应进一步深入百姓生活场域，走入街道社区、乡村农家，在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降低运营成本。“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走向更广阔的基层，或许可以赋予书店新的发展契机和生命力。”马瑞洁说。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绿洲。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是不灭的理想。”孙谦说。书店连接着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为宗旨，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读者心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据新华社

“乌苏”还是“乌苏”？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惩治坑人“李鬼”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乌苏”和“乌苏”，“一点”之差，你是否注意到？

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这起案件引发广泛关注——碰瓷“乌苏”啤酒，从名称到包装都如出一辙的“乌苏”啤酒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赔偿208万元。

22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发布一批典型案例。不少案例涉及你我耳熟能详的品牌和产品，彰显人民法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态度，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距离自己并不遥远。

有力惩治坑人“李鬼”，才能更好维护诚实守信市场环境。宁波某电器公司在海外注册“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并将此标识在其售卖的洗衣机机身上使用；南京某酒业公司注册“拉菲庄园”商标，攀附知名商标“拉菲”并做虚假宣传；上海某餐饮公司使用“米芝莲”标识，宣传“在香港话里‘米芝莲’就是米其林的意思”……

“傍名牌”“搭便车”的手段花样百出，让消费者防不胜防。这些案例中，人民法院严厉打击恶意注册、攀附使用、混淆市场的侵权行为，维护公平诚信市场竞争秩序，让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依法保护诚信经营，加强对驰名商标、传统品牌和老字号的司法保护力度。2023年，人民法院新收商标民事一审案件131429件，同比上升16.85%。新收侵犯注册商标类刑事一审案件6634件，审结6357件，同比上升33.45%和24.67%。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案件不少涉及外国企业。最高法三庭庭长林广海说，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回应外国投资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关切，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重拳打击侵权行为，必须让侵权者付出更重代价。6.58亿元，这是“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侵权案权利人的获赔金额。

“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林广海表示，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从严惩侵权行为入手，用足用好惩罚性赔偿，确保权利人得到足额充分赔偿。

据了解，2023年全国法院在319件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117%，赔偿金额11.6亿元，同比增长3.5倍。其中，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在8起案件中适用了惩罚性赔偿，切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保护力度。

“盼盼”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人民法院依法适用4倍惩罚性赔偿，全案判决赔偿1亿元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65万元；“西门子”案中，人民法院全额支持权利人1亿元的赔偿主张；“拉菲”案中，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侵权者赔偿7917万元……

林广海表示，知识产权赔偿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司法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人民法院将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推动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现裁判标准和裁判结果的平衡与协调。